



辛亥革命全景录 主编 金冲及

国家“十二五”规划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重点图书项目

共和大业

——聚焦1911

欧阳军喜 王宪明 等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辛亥革命全景录

主编 金冲及

国家“十二五”规划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重点图书项目

共和大业

—— 聚焦1911

欧阳军喜 王宪明 等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励 始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大业:聚焦 1911/欧阳军喜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
(辛亥革命全景录/金冲及主编)

ISBN 978-7-01-010190-3

I. ①共… II. ①欧…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792 号

共和大业

GONGHE DAYE

——聚焦 1911

欧阳军喜 王宪明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249 千字

ISBN 978-7-01-010190-3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到现在整整 100 年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比较少。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于 1941 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在世的话已经九十来岁了。林伯渠同志 70 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严重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改变。孙中山也总是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面，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的不足方面讲得比较多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过了 100 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 20 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表述。但这句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说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上提出了新的目标。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是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丧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了听凭外国殖民者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此后，中华民族逐渐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有两块巨石，一块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块是清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此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亲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可见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震动和影响之大。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到此为止。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租胶州湾，自此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领土，划分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后，八国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并实行分区管制，居民要分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这种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90年后邓小平同志还谈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接下来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刺激。中华民族已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长期以来，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许多国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

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认识还很不足，危机意识不强。1894年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觉得需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是在书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两字，不敢说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压力就太大了。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清政府的状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流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此时的清政府已然成为一个“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还是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在民怨沸腾、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际，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它还规定国家颁布法律、召开议会、调集军队、对外宣战、签订条约等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别强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可见，即使已到了穷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坚持那种极端专制的制度。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体在白银八千万两。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向日本的赔款就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加上分期缴付所需利息，相当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辛丑条约》按照人均一两白银的标准，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一方面，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这大大加深了对列强的依赖；另一方面，只能加重税收、加紧搜刮国民。至宣统三年，国家的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白银。当然，这不是生产发展而只能是加紧剥削的结果。

如何改变这样的危局？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等诸多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不仅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组建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尽管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辛亥革命

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历史重担。多少年来，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制度，而君主专制制度反过来又从政治上保障维护了封建土地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这样的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

有人评价辛亥革命导致了军阀割据，社会更加混乱。似乎革命徒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实际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后，旧势力只能靠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统治，显然这是无法持久的。而且，军阀混战使旧统治势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后人民革命的开展。所以尽管军阀混战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极大，但如果从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动荡和阵痛是社会转型期常需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正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道路。

三、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

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一切都是皇帝“乾纲独断”，老百姓根本谈不上有对国家建议和管理权力。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但上书的都是有功名的举人，并且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所上之书也没有能送达朝廷。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特别提出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点。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纸杂志空前活跃，

群众活动多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很难发生。另一点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将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推翻了，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能怀疑、不能推倒呢？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比寻常人还要可怜。”五四运动时期对许多旧事物的怀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

从近代历史上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还是皇帝；戊戌变法是想要靠一个好皇帝来实现；义和团运动打的还是“扶清灭洋”的旗号。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大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只有美国和法国，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件事不能小看。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严重的弱点和不足。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并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第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许多人认为推翻清政府后革命就成功了，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第二，它没有广泛地发动并依靠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并没有能依靠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农村没有一个大变动。而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势单力孤而易于妥协，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第三，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提出科学的明确的革命纲领、能依靠和发动最大多数群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党。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但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也促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受到它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



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历史事件是一步一步走的。中国的近代史就好像接力跑一样，后来的人以前面跑到的地方作为起点，接棒，然后又远远地跑到前一个人的前面去。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10年的历史，是不断探索、不断在矛盾中前进的历史。它留下的经验教训，不仅使我们了解共产党建立的必然性，而且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取得众所公认的突出成绩。但有一个问题仍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多样。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风俗习尚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它的发展在各个地区并不是以同一模式再演。共同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这在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历史时都需要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目光只集中在少数最引人注目的地区，很容易有简单化的缺陷，不足以完整地表现出这场革命的全貌，也难以看清这场革命在整个中国造成怎样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分省研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比较。这部丛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区。中国各地的情况复杂多样，丛书各卷分别对这些省在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状况、哪些社会力量发动了当地的革命、清朝疆吏是如何应对的、革命引起了哪些巨大的社会变化、旧社会势力怎样反扑等等，都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就便于进行比较研究：从相同的地方可以加深对这场革命共同规律的理解，从不同的地方又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这就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不作这种比较，既难更深入地把握住这场革命的发展规律，也难以看到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所以，这项工作对推进辛亥革命研究走向深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的。

但是，要进行这样全国性的大协作谈何容易。我很钦佩人民出版社和各省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下决心齐心协力来从事这项巨大工程。由人民出版社和17家地方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并组织出版的这套《辛亥革命全景录》丛书，在新闻出版总署支持下，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其中，《共和大业——聚焦1911》作为综合卷，总述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地方卷几乎每省一册（《直隶惊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包括了今天的两市一省）。这样，便全方位地概述了辛亥革命在各地的发展（可惜缺少了新疆、广西、福建和东北）。

承担了这项任务的出版社都把这项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社社长担任丛书的编委会委员，亲自抓，称为“社长工程”。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编辑工作会议，确定：作为历史性纪实丛书，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虚构；图文并茂，注意可读性；还制订了丛书的装帧设计方案和印刷技术标准等。

丛书作者都是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本地学者。书稿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对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动及跨界活动，不写或只作简单的交代。由本地学者写本地事件，有许多优点：史料搜集相对较易，除充分使用现存的文学资料外，作者还亲历有关历史遗迹，走访当事人及其后代，收集整理了不少口述史料，经认真考证后使用，使本书提供了较多新的资料。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责任编辑协助作者查阅大量档案资料，找到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图片，为丛书增色不少。

总之，这是一部集体努力的产物，必须归功于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当地专家学者。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由出版社邀约而承担了主编的名义，主要是表示对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支持和能够顺利完成的兴奋。我很希望各界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这部丛书的成果，并且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以便把辛亥革命研究更有力地推向前进！

金冲及

导 言

公元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革命的烈火几乎燃遍了全国，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81天后，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又过了42天，清帝宣布退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共和”从此引导着中国前进的方向，塑造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

这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变革之一。中国自秦至清，尽管历代风尚各有不同，制度多有损益，但总体上保持了一致性，实行的都是君主制，“皇权”始终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两千多年里，对君主制度的批判虽然很多，要求变革的呼声也一直存在，但都是“体制内”的批评，所关注的无非是漕运、盐政、治水、治边、吏治之类的“体制内”的改良，对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未有过怀疑。直到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与西方的抗争中屡屡失败，并因失败感受到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才有一部分中国人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改变，中国遭遇到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几千年未遇之强敌。对君主制的怀疑产生了，“改制”的呼声出现了。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的“共和”制度开始成为先进中国人所追求的共同理想和救国药方。

“共和”原本是一个古老的中文词汇，但现在却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它被用来指称一种与君主政体相对应的政体。要“共和”，就必然会动摇现行的君主制度和社会秩序。对统治者而言，实行制度的变革往往是被动的、极不情愿的。晚清的统治者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进行着“自改革”：从最初的“师夷之长技”，到后来的“采万国之美法”，再到后来的“预备立宪”，力度日渐增强，范围日益扩大，于是新式企业建立起来了，学堂出现了，责任内阁组成了，宪法大纲公布了。尽管一切在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清廷在变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迟疑和被动、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能和懦弱、在内政方面表现出来的贪婪和残暴，都无法使国人相信它能把中国引上

一条富强之路。尽管人们渴望秩序与和平，尽管很少有人愿意通过急剧的、暴力的革命方式去实现国家的变革，但残酷的现实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和平改良的幻想，转而同情或支持革命。这样，随着清廷改革的深入，人们变革的要求不是得到了满足，而是变得更加强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种西方式的共和制度。革命、共和，就这样成为历史的选择。

但是，共和大业的建立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武昌起义成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国实现了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主共和在当时只具形式，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已是不可逆转。从世界范围看，这是亚洲出现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中国走向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历史的步伐，一起来探寻近代中国是如何走向共和的吧。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走向革命	1
一、变革的开始	2
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	9
三、“新政”与旧秩序的动摇	14
四、新型社会力量的出现	19
五、早年孙中山	24
第二章 立会建盟	29
一、兴中会锋芒初试	30
二、从伦敦蒙难到惠州起义	36
三、留学生转向革命	45
四、革命团体相继建立	49
五、中国同盟会及其纲领	55
第三章 社会动员	63
一、联合改良派的尝试	64
二、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	68
三、“历史”的争夺	76
四、反满舆论的形成	81
五、立宪派的转向	88



第四章	武昌起义	95
一、战略重心北移		96
二、全国性革命形势的形成		101
三、武昌起义与湖北军政府成立		108
四、袁世凯复出		115
五、列强的反应及其影响		121
第五章	创立民国	129
一、王朝的解体		130
二、共和基础的奠定		135
三、危机		142
四、南北和谈与清帝退位		148
五、临时政府北迁		155
第六章	再造共和	161
一、从臣民到国民		162
二、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		165
三、动荡不安的政局		169
四、帝制与共和的较量		178
五、救国的新方向		184
主要参考文献		189
后 记		195

第一章 走向革命

- 一、变革的开始
- 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
- 三、“新政”与旧秩序的动摇
- 四、新型社会力量的出现
- 五、早年孙中山

在经历了差不多整个 18 世纪的“盛世”之后，中国开始出现衰败的景象。特别是到 19 世纪末，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国内民众愈演愈烈的反抗声浪的双重打击下，清王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了。从世界范围看，从历史上看，当政治败坏到难以维持正常统治的时候，当民众无法照常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晚清的统治者当然意识到了自身所面临的这种危机，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他们就试图通过某些局部的、缓进的变革，来缓和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阻挠和防止革命的发生。然而，当变革的闸门一打开，中国从此便进入了“变”的轨道。一旦进入变革——哪怕是微小的变革——的历史轨道，往下的发展就由不得统治者的意愿了。洋务运动之后不久，戊戌年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推动的激烈变革。当康、梁的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之后，不到三年，慈禧本人又不得不推出比康、梁更为激进的“新政”变革。慈禧“新政”施行的结果，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涌现出来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一切意味着一场更激烈的变革，即革命的风暴已是近在眼前。晚清政局，就这样沿着从小变到大变，从缓变到激变的轨道向前发展，迎来了辛亥革命的风暴。

一、变革的开始

让我们从洋务运动说起。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之后出现的。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的大门从此被打开。鸦片战争的失败，证明了中国政治上、制度上、观念上全面落后，非彻底改革无以自强。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世界的趋势和中国所面临的处境，朝野上下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对外国仍存轻视之心。与此同时，西方殖民势力却不满足于他们在鸦片战争后所获取的权益。他们希望中国能增开通

商口岸，并允许外国派使驻京，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为此，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者占领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再一次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在经历了这一次的打击之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仍然顽固不化，极端地仇外和排外。另一部分人则震惊于列强的“船坚炮利”，主张对列强妥协，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进行“自强”。这部分人就是通称的“洋务派”，其代表人物有朝臣奕訢、文祥，疆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积极推动清廷在外交、军事、教育各领域的变革，洋务运动由是而起。

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清廷统治政策的方向性转变，这就是由原来的“闭关锁国”转向“守约自强”。所谓“守约”，就是要遵守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不再与西方各国对抗，而是尽力与西方合作。为此，1861年清廷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处理与各国外交及通商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此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所有与外国相关的事务均由理藩院和礼部办理。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外交的开始。在随后的几年间，清廷不仅接纳了各国派驻北京的使节，而且自己也往各国派驻使节。同治年间志刚、孙家鼐之随蒲安臣出使美欧，是中国向外国派遣专使的开始，而光绪初年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中国对外派遣驻使的开始，实际上也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开始。

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强”，而“自强”的核心就是创办新式企业。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开办了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其中著名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这些企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启动。为了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还开始了教育文化方面的变革。一方面设立新式学堂，传授外国的语言文字和声光化电之学；另一方面是派遣留学生。1872年，清廷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幼童。虽然幼童留美的计划后来中断，但留学的风气却延续了下来。

洋务运动开始了新式外交，创办了新式企业，开办了新式教育。凡此种种，较之以前进步是非常明显的。然而此种进步与当时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较，则仍然相形见绌。19世纪60至90年代，正是世界性改革的时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俄国完成了农奴制改革；美国通过南北战争完成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德国、意大利等实现了国家统一；日本完成了